

MARXISM

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丛书

任平 主编

*Guixe lun
Yanjiu shizhu yu
Hexin wenti*

规则论

——研究视阈与核心问题

陈忠 著

 人民出版社

MARXISM

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丛书

任平 主编

*Guixe lun
Yanjiu shiyu yu
Hexin wenti*

规则论

——研究视阈与核心问题

陈忠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规则论——研究视阈与核心问题/陈忠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

(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01-006830-5

I. 规… II. 陈…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1361 号

规 则 论

GUIZE LUN

——研究视阈与核心问题

陈 忠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5.875

字数:33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830-5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总

序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 出场学视域

任 平

近年来,我提出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路径”,进而形成出场学视域,在受到国内学界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得到了本学科同仁的高度认同与支持。本丛书就是数年来我与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同人在这一领域做深入研究成果的汇集。这一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反思,更是一种创新探索。30年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不仅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成果,同时也唤醒了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自觉”,推进了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与时俱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在着力破除僵化教条的苏联教科书理解方式的基础上,教科书改革、文本学—文献学解读、与中西方哲学对话、问题反思等成为一系列推进理论创新的研究范式。然而,这些范式仍存在着种种偏颇,难以在总体上科学把握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逻辑。而探索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的历史使命,召唤着出场学的视域。这一视域强调在历史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三者关联中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逻辑,包括历史与哲学两个地平线、四大模块的理解范式:在历史地平线上,资本全球化成为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原初语境;新全球化时代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新语境。从历史到当代的地平线转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地平线从“当年”到“当代”的发展,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的总体逻辑。

一、出场学:探索马克思主义

出场问题的哲学范式

哲学研究的范式总是时代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问题、进而提出出场学范式首先基于一个时代性挑战。“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1993年,《哈姆雷特》中的这一句戏词,被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用来指认一个并非完全没有戏剧性效果的“历史事实”:由《共产党宣言》曾向世界宣告出场的“共产主义的幽灵”,随着苏东剧变与社会主义制度遭遇挫折,再一次退场为“幽灵”。的确,在旧工业化与资本全球化时代出场的马克思主义,遭遇新全球化时代,导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美帝国”新的全球霸权,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战争,生态主义和绿色政治,知识经济和消费社会,反思现代性

与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族性政治与文明冲突,新社会运动等等,使马克思主义当代性和在场性受到严重挑战,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在被边缘化,甚至遭遇当代退场的危险。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福山狂热的话语中,似乎“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①。如何在一个“脱节的时代”重新回答“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准确指认马克思主义言说的时代语境,深刻反思当代问题谱系和理论前沿,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就成为全球“左”派学者深切关注的时代聚焦点。在批判苏联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模式、深度反思苏东剧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出现了一大批新的思想设计,从德里达对马克思遗产“幽灵复活”路径的“幽灵学设计”,到詹姆逊以“意识形态批判”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为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为核心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想,到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资本主义批判”;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符号学解读”,到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与新历史唯物主义”;戴卫·格里芬对“美帝国”的重新批判,到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的形形色色的“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等等。人们不仅批判地反思苏联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批判地反思这一教条主义理解方式。人们不仅仅在深刻思

① 转引自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索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在场的可能性,在追问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和在场方式问题,而且更进一步对什么是“出场”以及马克思主义“如何出场”的问题作出科学系统的解答,这就需要一个完整的理论研究方法,这必然召唤出场学视域。在“脱节的时代”考察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我们需要关注:新全球化时代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选择出场路径的当代语境;如何重新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不断创新中实现与时俱进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题。出场学研究因此成为积极应对新全球化时代的挑战,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路径的哲学范式。对马克思主义当代的出场路径的研究需要从我所指认的“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这一历史语境的变迁入手,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三者的关联,把马克思主义始终看做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进而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历史逻辑。这一时代的思维方式,就是出场学视域。

其次,出场学视域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出场方式的深刻反思和“方法论自觉”。哲学变革总是成为历史变革的先导。30 年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为开端,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门,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取得了辉煌成就。思想解放与伟大实践不仅“与时俱进”地创造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成果,同时也唤醒了学界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苏联的以及一度影响中

国的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特征,不仅仅体现在其结论与见解上,而且体现在解答问题的范式上。僵化教条的理论见解是其僵化教条的研究范式的结果形态。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不仅包括对一系列僵化教条结论和观点的破除,而且包括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与研究视域的转换。“与时俱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按照库恩的见解,“范式”就是一种视野、规范、规则和方法论,它是一种见解、观点和理论的根基与灵魂。相对于理论结论或见解的变革而言,范式的变革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变革。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可以带动整个理论视域、理论形态的变革与创新。因此,当代中国学界提出的教科书改革、文本学—文献学研究、与中西方思想的对话、问题的反思等等,都成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毫无疑问,这些范式在多方面深刻破除苏联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僵化的理解方式,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深化与发展。但是,客观地评价这些研究范式,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某些领域、方面、路径的创新,进而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意义的重新理解,它们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带有一个时期的历史痕迹,还没有达到“与时俱进”研究范式应有的总体高度。“教科书改革”应当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起步最早、成效显著的研究路径。究其原因,一方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苏联版教科书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传播的主要理论来源、创新与发展的基础就是苏联教科书体系,特别是

斯大林主持下的《联共(布)党史》的四章二节。另一方面,时代与空间实践的差异性,需要通过某种“新观点、新原理”的方式加以表达。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步实践经验、与时代特征的现代生活及新科技革命的现实相结合,“充分反映”当代中国实践新思想、新见解、新概括就成为教科书改革研究的主要思绪。教科书改革范式在系统地普及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新理解、新运用方面起到了别的范式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是,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最大缺陷就是容易“非历史”地对待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容易造成对“原理”理解的思想僵化。此外,“原理体系+事例”的叙述方式也不断遭人诟病。因此,为了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思想的发展,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学者批判以往教科书“非法(非历史)”引用文本的方法,主张从历史发生的角度,从文本学与文献学范式去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进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意义。正如这一范式的提出者所说的:为了今天的理论创新必须“首先廓清理论的地平”,以时代的视野去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原初语境。它不是“顽强的崇古意识”,因为在它的视野中马克思的文本不是“现成在手”而是要“重新打开”和“重新上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初语境的分析是一种渐次展开的“历史现象学”。这一阐释范式借助于当代解释学的许多成果和方法,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基础性方法。但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不可能仅仅通过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考订与解读、仅仅通过文本学—文献学研究来达到。正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

文本思想形态对出场语境与出场路径具有深度的依赖性,因而是历史的出场形态。^① 要科学深刻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思想,必须要穿越文本,深入背后去把握历史语境、出场路径与文本形态的关联。此外,“重新上手”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意义,需要获得一种时代的视野,而时代视野来源于当代实践与当代对话。与当代西方思想积极展开深入的对话,于是成为一种新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当代性与在场性的研究范式。本着“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和“让马克思走入当代”的基本判断,这一范式的倡导者认为:通过与当代西方一系列思想的对话,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在场性才能够彰显。的确,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大道。既然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诞生需要借助于当年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与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中后期思想的发展需要在与当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相关领域思想成果的对话中实现,那么,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就更没有理由不通过积极的思想对话来汲取一切优秀思想成果实现自己的与时俱进。对话是打磨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锋的砺石。但是,对话需要历史的底板、时代的基础和实践的尺度,否则,对话就失去了时代真理的标准。从历史实践这一语境出发去理解对话和评判对话,建立与时俱进的理解范式,这就重新呼唤出场学研究。以“问题反思”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同样需要出场学视域。这一范式涉及两个基本层面的相互关系:一是“问题中的哲学”,就是将时代实践

① 参见任平:《论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形态》,《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

问题转换为哲学问题；二是“哲学中的问题”，就是考察哲学的问题意识，看哲学如何反映、把握时代问题并在哲学中加以解答。两者的结合，就是时代实践与哲学的与时俱进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如何从历史语境出发去看待问题与哲学的关系。这一研究，不能不使我们面对出场学。因此，出场学视域就是在总体上与时俱进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也应当成为其他的研究范式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的必然产物。

因此，提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旨在探索：在差异的时代和空间中孕生的差异化马克思主义对各自语境的依存关系，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而与时俱进地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

作为总体上“与时俱进”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学研究，“出场学”首先专指一种视域，即从出场问题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和空间的在场可能性。“出场”首先相对于“退场”、“缺场”而言。反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同盟”当然极力否定马克思思想出场和在场的可能性，祈望彻底埋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导权甚至话语权，让马克思主义永远“退场”和“缺场”。“出场”也不同于“在场”。自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以来，如何看待“在场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一直在思索的重大问题。一切教条主义则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现成的、永恒不变的“现成在场状态”，过去、现在、将来一劳永逸地指向在场，我们只需要去认真解

读和理解其本真意义。然而,当人们将其看做一成不变的“在场形态”时,实际上又不断地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一在场作出理解,进而解释为各自的、多元的体系。因此,马克思思想的在场一旦进入这些理解中就不断地被撕裂为各种样态的存在方式。但是,马克思的思想旨趣是不断出场的,永远不是一种凝固不变的现成在场状态。马克思哲学从来就不是德里达在指认海德格尔哲学时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所谓“在场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通过“改变世界”的方式出场,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对资本全球化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从来就坚决反对将自己的思想奉为一成不变的圭臬,而是一种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创新、不断出场的思想旨趣。出场是对现成在场状态的超越。出场永远是对出场路径、出场方式与出场形态的时代选择。出场学视域绝不是对现成在场状态的简单反映和概括,而是对其现实和未来在场可能性的谋划和探索。

其次,“出场学”也是一种专门化的研究范式,其理论的理解框架包括两大地平线、四个模块。所谓两大地平线,即历史地平线与哲学地平线;而每一个地平线的变化又界分为从“当年”到“当代”两个时代维度,因此可以区分为四个基本模块。历史地平线的转换就呈现为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新旧更迭,“当年马克思”就必然地需要转换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思想的与时俱进。从当年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换,我们需要深度思考其中的三个关键环节: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出场语境——历史地平线转换的思

考。伽达默尔曾经说过：“处境这一概念的特征正在于：……我们总是处于这种处境中，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某个处境里，因而要想阐明这种处境。”^①尽管这一阐明是非常困难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出场语境的追问应当包括下列问题：什么曾经构成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或“原初语境”？什么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新语境？从历史语境到当代语境，其间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具有怎样的“历史间距”？这一差异对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出场语境不仅是文本意义的结构，而且首先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所构成的历史结构。出场语境首先是历史时代——马克思思想赖以出场的现实基础。此外，出场语境绝不是一种与主体无关的纯客观状态，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化出场方式。因此，这一研究既是对客体的历史语境的分析，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出场方式的考察。对主体不断打开的“上手”过程。要深度考察和科学辨识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的时代语境，进而研究出场语境如何从当年到当代的演变。正如我一再指出的：马克思生活在一个以资本全球化为中心的旧全球化时代，资本全球化造就了马克思哲学出场的“周围感性世界”，成为其新世界观赖以建立的历史地平线。这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到处打破民族壁垒、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资本全球化形成了两极化的世界体系：使乡村服从城市、农业服从工业、劳动服从资本、东方服从西方。资本全球化成为马克思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

新世界观出场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新哲学世界观就是对这一资本全球化历史地平线所作的深刻批判的反思。它的问题谱系与理论视野具有对全球化一般本质和规定的揭示,因而在新全球化时代具有与日俱增的价值。然而也无可否认的是,旧全球化时代造就了历史的边界与局限性,从而必须要为当代语境所修正。今天,与旧全球化时代相比,新全球化时代在生产方式、全球结构、内在张力、控制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大转换,因而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出场新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与在场性所遭遇的一切“脱节”和挑战,都来源于新全球化时代所造就的时代语境的影响。高度关注一系列新全球问题并成为“反思的问题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与出场方式。解答问题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形态。

对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语境分析还内在地包括空间性考察。思想传播的地理学图景表明:由于各地土壤和气候条件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生长和发展就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本土化语境对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与认同具有再创造和再理解的功能。这里,在空间语境作用下,我们必然要研究一个基本问题:来自西方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如何本土化,或者说,如何理解“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与本土化“再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一空间的坐标系不仅造成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差异,而且也必然造成与“原版”的马克思思想的许多差异。某些当年马克思“仅限于西欧”的结论,在中国语境中必然会发生

重大改变。“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之间总是存在着历史的和空间的张力。围绕这一张力,我们可以将许多研究范式置于其中加以评价。思想必然随着客观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两种思想差异如果说是因为言说语境的变化而造成的,那么,这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然的。如果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和矛盾,我们的理解应当倾向于坐标的历史语境。这才是对理解的科学性的正确立场。

第二,对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的考察。这应当关注两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对于出场路径有深度的依存性。任何文本的意义、理论表现方式、存在形态其实都是一种依赖于出场路径的出场形态。我们绝不能仅仅根据文本解读就作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一劳永逸的结论。我们不能将在特定的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中形成的文本结构奉为理论的永恒。我们不仅需要深刻地解读文本意义、把握文本理论结构,更重要的是要深度考察文本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和路径。文本意义、文本理论形态实际上只不过是出场形态,是受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决定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发生时代变迁,那么就应当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场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仅表现在理论主题和理论内容的变迁,也同样表现在理论形态的变化上。正是后者,召唤马克思主义形态研究的出场学视域。其二,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是“一体两翼”的创新格局。所谓“一体”,就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实践反思,这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基本路径。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根本的出场方式必然是一种行动的逻辑,永远需要在“改变世界”的创新实践中出场。出场方式

和出场路径的实践化,是颠覆形而上学、哲学革命的理论旨趣。如果说,当年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出场主要在于摧毁一个旧世界,那么今天“改变世界”的实践更需要在中国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不断创造出“中国经验”,进而创造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阶段的理论。在实践中出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路径,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反形而上学的基本品质。文本重读或返本开新式,与当代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各种学术思潮对话式,都是在实践反思的基本路径上生成的具体路径。在这些路径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将新全球化时代和中国发展的重大时代问题进行反思成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基本路径,是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性和“时代精神精华”的时代性品格使然;对马克思文本意义的重新解释和与当代中西哲学对话之所以成为两翼,是因为它们的创新维度都来源于时代,问题的解答都围绕时代主题,它们的评判标准或者“前理解结构”都依赖时代底板。解读式创新之所以能够创新理解,不是现成“在手”而是“上手”,主要是因为这一解读建立在当代解读者的时代视域之上,他们是依靠来自时代视域(前理解结构)、带着时代问题对当年马克思文本意义的重新解读,从而读出新意、推进创新的。这一解读,实际上是当代读者与当年文本超越“历史间距”的视域融通,一次真正的时代水平的神会,因而是时代的精神存在方式。对话式创新同样基于时代。虽然当代西方思潮在总体上难以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依然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它们之出场是因为时代困境,它们提出

的问题是时代的,而它们解答问题的思路 and 方式也是时代的。它们是时代问题在当代西方学者头脑中的哲学反映。因此,对待当代西方哲学,或者是当代中国哲学(如新儒学等),就是对待某种形式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不可能采取一笔抹杀的方式。在这里,一个长期僵化的观念必须得到纠正。这一僵化观念就是:似乎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在流淌到马克思那里就终结了,或者就变成马克思主义这一唯一有价值的脉系了。在马克思之后,一切西方当代哲学都是没落的、腐朽的,因而是人类文化的渣滓。因而,在马克思充分汲取当年人类文明的许多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社会学说和历史学说等)并创立自己的世界观之后,就标志着非马克思主义文化史的价值终结,似乎马克思主义无须再认真面对当代西方的或者中方的思想残渣余孽,它们与时代是脱节的、毫无关联的,它们只存在于过去,而没有当代,更没有未来,对此马克思主义只需外在地加以批判和否定,就一切烟消云散了。实际上,否定了当代西方哲学的时代性,也同时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不仅需要时代实践的驱动,也需要当代精神、当代思想的滋养。承认当代西方思潮、特别是当代西方哲学的时代性,就意味着:我们要从全盘否定到科学分析,从外在旁观到参与对话。对当代中西非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重新认识,必然引领马克思主义走向对话,在思想撞击和学术对话中磨砺思想之锋,在重新不断批判地汲取对话者的优秀思想资源中成为当代话语。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同样需要汲取当代优秀思想资源,同样